

读书有感

程晖所著的长篇小说《进贤仓》(百花洲文艺出版社、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),以位于现今江西南昌西湖区的历史文化街区“进贤仓”为基点,通过宁王后裔的家族命运与革命洪流的交织,勾勒出南昌地域文化在历史激荡中的承续与嬗变。

小说将叙事锚点设定在1949年,解放军团政委马湘杰

率领部队,在义父牛森有的引领下,自进贤仓街的竹器间悄然穿行,驻足于进贤门古樟下。当解放军工兵掘进坑道时,在这条“垂直的时间轴”中,不同朝代的砖墙在土地深处宛如年轮般交错。这条沉睡的坑道,镌刻着灌婴筑城、陈友谅与朱元璋对决、太平天国烽火、李烈钧扩城等纷沓印记。在层层叠压的“地层学”中,历史纵深与日常生活并置。这条坑道也因之具有了双重象征;这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通道,更是城市记忆的物质载体。

作者在书中建构起独特的“空间诗学”,一座城的古老记忆被唤醒——杏花楼不仅是矗立在湖畔的小楼,而且是宁王朱权编纂《神奇秘谱》时窗外的一抹春色;百花洲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标识,而且是承载着苏东坡、辛弃疾吟咏过的湖光山色;青云谱墨中,八大山人笔下的孤鸟用翅膀振辟宣纸的边界;万寿宫前,许逊治水的神话与香火一道袅袅升起……风华绝代的南昌自“豫章旧事”的风烟中苏醒,重新获得深沉而壮丽的文化新生。

《进贤仓》将牛氏家族设定为明代宁王朱权的后裔并非偶然的文学想象,而是对地域精神源流的深度溯源,长期处在历史暗影之中的宁王一系文化传承,因之被推至叙事的光之下。朱权作为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,改封南昌后寄情山水,以一代文化巨匠之姿留名青史,至九世孙朱脊,也就是八大山人,以极致的简约与变形,充分展现出东方写意艺术的非凡魅力,“墨点无多泪点多”的孤高气质,已然成为宁王遗脉的精神写照。

在作品中,宁王后裔拆“朱”为“牛”,易姓蛰居于进贤仓一带。牛氏家族在历史洪流中的复杂心态与变迁,折射出南昌地域文化生态的深刻嬗变。曾经依附于庙堂的礼乐典章、艺术审美,随着宗室后裔流落民间散逸再生,渐次与本土的市井风情与民间信仰相融合。这一过程,既是高雅文化的普及和落地,亦是民间文化的吸纳与升华,更凝缩了当时社会渐进式和解的漫长轨迹。

小说中历史虚构的精彩之笔,则来自石达开与少年牛森必在南昌的相遇。当石达开下马为流民中的少年包扎伤口时,石达开的枣红战马与青色战袍、金光闪闪的佩剑流苏与踏破薄冰的战靴,在少年的视角中次第呈现,它们既是特殊环境下的温情瞬间,亦是英雄主义的人格化呈现,更是历史连续性的微观证明。短暂的风云际会,点燃了少年一生的精神火种。以致在太平军兵败后,牛森必意欲焚烧清廷要员程矞采在家乡兴建的私人宅第,以践行朴素的复仇。作者借由少年的怒火,完成牛氏家族革命因缘的叙事铺垫,更巧妙地以此为叙事契机,引入汪山土库程氏家族这一文化坐标。这座赣派建筑群以“一门三督抚”的荣光,构建起一个以文化传承与家国责任为内核的价值体系。月光之下少年与汪山土库的默然对峙,两种历史逻辑的对话在南昌的夜空下形成巨大张力,彰显出时代激荡中沉稳而又坚韧的精神力量。

近代革命元勋李烈钧的登场,赋予小说文本更为深沉的历史纵深感。少年李烈钧与牛森有在百花洲一见如故,人物之间意气相投,更是文学想象与历史脉络的精巧嫁接。当李烈钧全家遭遇暗杀,牛森有与马湘杰施以援手,则形成小说的情节关键推力——落魄的宁王后裔与坚定革命者的命运紧紧缠绕,这一叙事策略,让江湖义气与革命理想彼此照亮,揭示出历史变革中复杂的情感网络与人性联结,也暗示着在时代洪流中,不同人群因共同的信念而结为命运共同体。

小说以两条并行的命运轨迹,构建出深广的叙事空间。一条叙事线索沿着以李烈钧真实的人生轨迹展开:在江西的政治军事实践,锐气渐消、心事浩茫的晚年光景,归葬故里的人生终章。另一条叙事线索则是牛氏家族的孙子牛望方、牛森放、牛森方在抵御日军入侵的烽火中慨然赴死。李烈钧的“埋骨桑梓”与牛家儿郎的“马革裹尸”,这种虚实交映的叙事策略叩响了一个浩荡的时代主题:历史并非仅由英雄人物与大事记构成,那些悄然湮没的悲痛,同样是支撑一个时代前行的深沉路基。在近代中国的激荡岁月里,个人命运始终与家国荣辱与共、休戚相关。

作者深植于江西丰厚的文化资源,以高度自觉的本土意识,在历史宏大叙事与南昌地方经验之间,展开一种既扎根传统又指向当下的文学书写。在这种兼具历史纵深与当代意识的书写中,美食与民俗并非点缀性的风物陈列,而是作为小说有效叙事装置,深深嵌入文本肌理之中,它们既是推动叙事背景、刻画人物的灵魂线索,亦成为解读南昌地域文化基因的美学密钥。小说结尾的收束之处是解放军接管南昌后,马湘杰造访牛森必家,义母万白儿端来一碟桂花糕,马湘杰一口咬下去,桂花香在舌尖弥散开来,犹如普鲁斯特式的味觉开关骤然启动,往事纷至沓来,那一瞬间的温存与惆怅,与开篇遥相呼应,构成回环叙事的闭环。桂花糕糯米清甜的质感与桂花馥郁的芬芳,沉淀为个体生命里一场静默的味觉重逢,它在刹那间唤醒了蛰伏在人们心底深处的乡土之恋,成为特殊语境下温暖人性的象征。在“英雄城”南昌的宏大叙事之下,峰嵘的历史背影,始终流淌着柔软而持久的生活底色,它令我们相信,无论时光如何流转,总有一些物事如桂花的芬芳,年年岁岁归来,不绝如缕。当战争的硝烟散尽,文化在历史断裂处延续,于人的聚散离合之中重生。

这部作品超越了家族叙事与断代史的框架,展现出更为深远的文学抱负:以叙事为经纬,为一座城市绘制一幅流动的“记忆图谱”,那些散落于岁月深处的碎片,在语言的照亮与缝合下,最终叠印为一座城市不朽的灵魂地图。在这幅图景中,历史沉潜为城市的脉搏,持续参与并塑造着这里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。

(转自光明网)

唐音宋韵 余响不绝

——评《汲古为新:历代词人对唐宋词的接受》

□ 张再林

唐宋词数量众多,成就巨大,影响亦深远,其传播与接受情况错综复杂。如何直探核心,既完整系统又清楚直观地展现唐宋词在词人中的传播和接受情况,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。近读苏州大学教授钱锡生的《汲古为新:历代词人对唐宋词的接受》(以下简称《汲古为新》)一书,觉得作者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,理由有三。

一是研究角度契合。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这一课题,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,如词选、词论的角度,唱和、鉴赏的角度,版本流传的角度等等。这些角度固然重要,但不免给人以一种“恨隔炉烟看未真”(晏几道《采桑子》)的感觉,不如从艺术创作承续的角度来得直观和真切。正因看到了这一点,作者坚持从艺术创作出发来观照研究对象。比如,想要了解李清照名句“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,凄凄惨惨戚戚”在词中的接受情况,便看史籍言“寻寻觅觅,清清冷冷,踏遍颓垣荒芜”(《鹊桥仙》),看陆游言“风风雨

雨,燕燕莺莺,朝朝暮暮戚戚”(《声声慢》),看席佩兰“萧萧瑟瑟,惨惨凄凄,呜呜咽咽”(《声声慢》)。再如,姜夔词以“幽韵冷香”为特色,这与其喜用“冷”色调的词语密切相关,书中特辟专节,论述了姜夔冷色调词语的接受情况——清吴藻云“冷香飞上诗句”(《探春》),李慎溶云“正冷月、无声空窟”(《疏影》),周岸登云“风尘冷月无声”(《相见欢》),这些句子“都颇为神似白石词”……这种艺术创作承续的研究视角,更容易让读者直观地获知唐宋词在后世的接受情况。

二是取舍得当。在确定了研究视角后,接下来面临的即是如何取舍词人、词作的问题。研究历代词人对唐宋词的接受,不仅要熟悉唐宋时期的词人、词作,还要了解宋代以后各个时代的词人、词作,这样才能从中发现二者之间的传承和接受关系。据目前已出版的历代词总集统计,唐宋词共有词人1639家、词作23864首;金元、明、清、民国词共有词人7858家、词作235万余首。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研究对象,作者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检索手段,在综合分析后代词人对唐宋词的唱和、效体、摹括、集句等情况的基础上,最终精心选择了温庭筠、李煜、晏殊、欧阳修、柳永、苏轼、晏几道、秦观、周邦彦、李清照、辛弃疾、姜夔、史达祖、吴文英、张炎15家唐宋词人作为典型代表,研究后世对他们的“发现”和接受情况。关

于这15家词人的成就和贡献,学界已有深入研究和公论共识,无需赘言,他们的代表性也毋庸置疑。通过分析论述他们词作的接受情况,可以达到以点带面和以简驭繁的效果。

三是论述细致。在确定了研究角度和具体对象之后,作者又根据上述15家唐宋词人的具体接受情况,为其“量身定制”研究内容,每一家都不雷同。如对温庭筠,主要研究其语言的借用、化用以及篇章借鉴方面的情况;对晏殊,主要研究其袭用与截取、改易与增缩以及点化与仿写方面的情况;对苏轼,重点研究其“韵”“句”“篇”三个层面的接受情况;对辛弃疾,重在研究其语汇、意象、句子、句意、句式、体式、语体的接受情况……而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,作者更是细致入微地发掘前代词人的余音遗响。如对李煜词的接受,书中特设“词句”一节,并将其细分为“原封不动”“改易字词”“增删字词”“调整语序”及“重构词句”等五种接受方式,又对每种方式再进行细分,详细举例说明。这样的处理,能反映李后主词作几乎首首是精品、句句是金句的特点。再如对周邦彦的词,特设“修辞”一节,论述其词中的比喻、拟人、对偶以及设问、反问的接受情况。在对偶一项,又细分为两对句、三句对、隔句对以及人名对等四种情形。如此细致的论述,不仅清晰地呈现了后人对周邦彦词修辞手法的接受情况,也可让读者一览周邦彦词作对偶精工的艺术特色。

掩卷遐思,只觉唐宋词的余香遗韵在胸中流荡,氤氲满怀。笔者以为,该著能给人带来如此美妙的阅读体验和感受,不仅源于著者在词学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,也得益于其文艺创作经验。钱锡生曾担任总制片主持拍摄纪录片《苏国六纪》,对苏州乃至江南文化的雅致与精微颇为了解。其积十余年之功编著的《文史合璧》《词学与词心》《汲古为新》等作品,也延续了文艺创作精巧雅致的一贯风格,使人虽未知其详却已仿佛置身于唐宋词的“百花园”中,典雅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(转自光明网)



程晖所著的长篇小说《进贤仓》(百花洲文艺出版社、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),以位于现今江西南昌西湖区的历史文化街区“进贤仓”为基点,通过宁王后裔的家族命运与革命洪流的交织,勾勒出南昌地域文化在历史激荡中的承续与嬗变。

小说将叙事锚点设定在1949年,解放军团政委马湘杰

率领部队,在义父牛森有的引领下,自进贤仓街的竹器间悄然穿行,驻足于进贤门古樟下。当解放军工兵掘进坑道时,在这条“垂直的时间轴”中,不同朝代的砖墙在土地深处宛如年轮般交错。这条沉睡的坑道,镌刻着灌婴筑城、陈友谅与朱元璋对决、太平天国烽火、李烈钧扩城等纷沓印记。在层层叠压的“地层学”中,历史纵深与日常生活并置。这条坑道也因之具有了双重象征;这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通道,更是城市记忆的物质载体。

作者在书中建构起独特的“空间诗学”,一座城的古老记忆被唤醒——杏花楼不仅是矗立在湖畔的小楼,而且是宁王朱权编纂《神奇秘谱》时窗外的一抹春色;百花洲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标识,而且是承载着苏东坡、辛弃疾吟咏过的湖光山色;青云谱墨中,八大山人笔下的孤鸟用翅膀振辟宣纸的边界;万寿宫前,许逊治水的神话与香火一道袅袅升起……风华绝代的南昌自“豫章旧事”的风烟中苏醒,重新获得深沉而壮丽的文化新生。

《进贤仓》将牛氏家族设定为明代宁王朱权的后裔并非偶然的文学想象,而是对地域精神源流的深度溯源,长期处在历史暗影之中的宁王一系文化传承,因之被推至叙事的光之下。朱权作为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,改封南昌后寄情山水,以一代文化巨匠之姿留名青史,至九世孙朱脊,也就是八大山人,以极致的简约与变形,充分展现出东方写意艺术的非凡魅力,“墨点无多泪点多”的孤高气质,已然成为宁王遗脉的精神写照。

在作品中,宁王后裔拆“朱”为“牛”,易姓蛰居于进贤仓一带。牛氏家族在历史洪流中的复杂心态与变迁,折射出南昌地域文化生态的深刻嬗变。曾经依附于庙堂的礼乐典章、艺术审美,随着宗室后裔流落民间散逸再生,渐次与本土的市井风情与民间信仰相融合。这一过程,既是高雅文化的普及和落地,亦是民间文化的吸纳与升华,更凝缩了当时社会渐进式和解的漫长轨迹。

小说中历史虚构的精彩之笔,则来自石达开与少年牛森必在南昌的相遇。当石达开下马为流民中的少年包扎伤口时,石达开的枣红战马与青色战袍、金光闪闪的佩剑流苏与踏破薄冰的战靴,在少年的视角中次第呈现,它们既是特殊环境下的温情瞬间,亦是英雄主义的人格化呈现,更是历史连续性的微观证明。短暂的风云际会,点燃了少年一生的精神火种。以致在太平军兵败后,牛森必意欲焚烧清廷要员程矞采在家乡兴建的私人宅第,以践行朴素的复仇。作者借由少年的怒火,完成牛氏家族革命因缘的叙事铺垫,更巧妙地以此为叙事契机,引入汪山土库程氏家族这一文化坐标。这座赣派建筑群以“一门三督抚”的荣光,构建起一个以文化传承与家国责任为内核的价值体系。月光之下少年与汪山土库的默然对峙,两种历史逻辑的对话在南昌的夜空下形成巨大张力,彰显出时代激荡中沉稳而又坚韧的精神力量。

近代革命元勋李烈钧的登场,赋予小说文本更为深沉的历史纵深感。少年李烈钧与牛森有在百花洲一见如故,人物之间意气相投,更是文学想象与历史脉络的精巧嫁接。当李烈钧全家遭遇暗杀,牛森有与马湘杰施以援手,则形成小说的情节关键推力——落魄的宁王后裔与坚定革命者的命运紧紧缠绕,这一叙事策略,让江湖义气与革命理想彼此照亮,揭示出历史变革中复杂的情感网络与人性联结,也暗示着在时代洪流中,不同人群因共同的信念而结为命运共同体。

小说以两条并行的命运轨迹,构建出深广的叙事空间。一条叙事线索沿着以李烈钧真实的人生轨迹展开:在江西的政治军事实践,锐气渐消、心事浩茫的晚年光景,归葬故里的人生终章。另一条叙事线索则是牛氏家族的孙子牛望方、牛森放、牛森方在抵御日军入侵的烽火中慨然赴死。李烈钧的“埋骨桑梓”与牛家儿郎的“马革裹尸”,这种虚实交映的叙事策略叩响了一个浩荡的时代主题:历史并非仅由英雄人物与大事记构成,那些悄然湮没的悲痛,同样是支撑一个时代前行的深沉路基。在近代中国的激荡岁月里,个人命运始终与家国荣辱与共、休戚相关。

作者深植于江西丰厚的文化资源,以高度自觉的本土意识,在历史宏大叙事与南昌地方经验之间,展开一种既扎根传统又指向当下的文学书写。在这种兼具历史纵深与当代意识的书写中,美食与民俗并非点缀性的风物陈列,而是作为小说有效叙事装置,深深嵌入文本肌理之中,它们既是推动叙事背景、刻画人物的灵魂线索,亦成为解读南昌地域文化基因的美学密钥。小说结尾的收束之处是解放军接管南昌后,马湘杰造访牛森必家,义母万白儿端来一碟桂花糕,马湘杰一口咬下去,桂花香在舌尖弥散开来,犹如普鲁斯特式的味觉开关骤然启动,往事纷至沓来,那一瞬间的温存与惆怅,与开篇遥相呼应,构成回环叙事的闭环。桂花糕糯米清甜的质感与桂花馥郁的芬芳,沉淀为个体生命里一场静默的味觉重逢,它在刹那间唤醒了蛰伏在人们心底深处的乡土之恋,成为特殊语境下温暖人性的象征。在“英雄城”南昌的宏大叙事之下,峰嵘的历史背影,始终流淌着柔软而持久的生活底色,它令我们相信,无论时光如何流转,总有一些物事如桂花的芬芳,年年岁岁归来,不绝如缕。当战争的硝烟散尽,文化在历史断裂处延续,于人的聚散离合之中重生。

这部作品超越了家族叙事与断代史的框架,展现出更为深远的文学抱负:以叙事为经纬,为一座城市绘制一幅流动的“记忆图谱”,那些散落于岁月深处的碎片,在语言的照亮与缝合下,最终叠印为一座城市不朽的灵魂地图。在这幅图景中,历史沉潜为城市的脉搏,持续参与并塑造着这里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。

(转自光明网)

悦读

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

——读宗白华《美学散步》

□ 彭锋



荐书人语

美学散步,书如其名。阅读该书,就像在美学丛林中漫步;从中国到西方,从诗歌到绘画,从音乐到舞蹈,从园林到书法……尤其是对中国艺术意境的把握,第一次有人把中国艺术的奥秘说得那么清楚、深刻而又亲切。

宗白华的《美学散步》是一部经典美学著作。书中收录的文章涉及美学和文艺的一般原理、中国美学史和中国艺术论、西方美学史和西方艺术论以及诗论等,写作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,其中一些文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奠定了作者的学术地位,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考验,今天仍然为读者津津乐道。

从起点来看,宗白华本该是位诗人。上世纪20年代,他在德国留学初期写的诗歌结集成《流云》出版,与同时期活跃的白话诗人作品相比毫不逊色。但“剧情”没有按常规发展。《流云》出版之后,宗白华不再写诗,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哲学和美学研究。当然,他也没有跟

诗告别,他用另一种方式续写诗篇。这或许就是宗白华用“散步”来命名自己美学文集的原因。

就像宗白华自己说的那样,散步是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行动,没有计划,没有系统,但并非没有逻辑。用美学术语来说,散步是无利害的,不同于有目标的赶路。无利害的散步,类似于庄子的“逍遥游”。

宗白华在柏林大学师从德国美学家德索。德索特别强调审美经验和艺术鉴赏对美学研究的重要性,主张美学不要在教室里讲,而要到美术馆、音乐厅、大剧院里学,要从审美经验和艺术鉴赏中去体会。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深受德索影响,他也是美术展览和文艺演出的常客。不过,德索并没有能够像宗白华那样在美学里散步。我们读德索的文章和著作,会发现他与别的美学家没有太大的区别,也是有计划、有系统地写作。宗白华的散步姿态不是来自德索,而是来自庄子,来自中国的艺术和学问。

在1921年从德国给友人的一封信中,宗白华谈到自己像很多人一样,到了欧美后才发现中国文化的伟大。作为研究并翻译了《判断力批判》的康德专家,宗白华学习和研究西方美学的目的非常明确,就是用它来加深对中国美学的自我认识。中国的美学和艺术评论散见于各种文献,很少有长篇大论,不追求系统性。这种点评短论,更容易切入要害,而且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,在给人洞见的同时也

带来审美享受。宗白华的散步美学,正是这种传统的延续。

与西方艺术追求完美的形式不同,中国艺术追求气韵生动。宗白华正是以意境、意象、气韵、生动等中国传统美学概念为基石,阐发中国美学的独特性,弘扬“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”。在随作者一同“散步”的过程中,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,《易经》中的“刚健、笃实、辉光”,怎样代表了中华民族一种健全的美学思想;民族“自信力”亦即民族精神的表现与发扬,为何依赖文学的熏陶;为什么说魏晋六朝视“初发芙蓉”比“错彩镂金”美学境界更高,是一场美学思想上的解放,诗、书、画由此成为活泼的生活的表现。

宗白华说,“适我无非新”是艺术家对世界的感受,“光景常新”是一切伟大作品的烙印,“温故而知新”却是艺术创造与艺术批评应有的态度。“历史上向一步的进展,往往是伴着向后一步的探本穷源。”研寻中国艺术意境的独特的结构,以窥探中国人心灵的幽情壮采,正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工作。他在百年前发现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,预见了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,在今天的国风国潮中得到了验证。

中国美学推崇“生”、推崇“化”,审美就是化实为虚、化景为情、化世界为心灵,让宇宙人生节奏化、音乐化。所以,尽管内心世界和物质世界有美,但是宗白华主张到生活世界中去寻美。把自己关在内心世界难免苦闷,把事物还原为

原子世界难免无趣,美在丰富的生活世界中。通过“移我情”,内心